

闻友信

教育纪念文集

萨兆湘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闻友信教育纪念文集

萨兆湘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闻友信教育纪念文集/萨兆湘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04-025147-0

I. 闻… II. 萨… III. ①职业教育-文集②闻友信-纪念文集 IV. G71-53 K825.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7420 号

策划编辑	张雪辉	责任编辑	王清云	封面设计	刘晓翔
责任绘图	黄建英	版式设计	王艳红	责任校对	王效珍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总 机 010-58581000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9
字 数 400 000
插 页 8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3.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5147-00

纪念闻友信同志

(代序)

王明达

闻友信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在 6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除了从事新闻管理工作外,他 50 多年都是从事教育管理工作,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教育事业。建国初期,他在政务院文委、高教部工作,积极参与了全国文教事业“一五”计划的制订以及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面的有关工作。1956 年,他响应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举家到兰州大学。先后在兰州大学教务处工作,后来,又担任了现代物理系副主任和学校副教务长工作,1977 年,回到了教育部高教司任理科处处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央非常重视教育结构改革,重视职业教育。1982 年,他调任职教司副司长。以后 20 多年,就一直奋斗在我国职教战线。他对职业教育有高度的认识和深厚感情。他曾深入基层进行了大量的调研,针对职业教育中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分析、政策建议和行政措施,为后来我国职业教育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结合实际工作,他写出了数十篇论文,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丛书中《职业教育史》一书。还撰写《职业指导的理论与实践》、《择业指南》等著作。

1985 年 5 月,我到国家教委工作,分管职业教育。和闻友信同志在工作上有诸多联系,他对中央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积极、坚决贯彻,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受到职教战线同志们的赞扬。1985 年,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地位,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明确了发展职业教育的具体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力争在五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并明确“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发挥中专的骨干作用,“逐

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对贯彻中央的上述决定,闻友信同志非常坚决,在《决定》颁布不久,1985年8月,他就在大连组织各省、市、自治区负责职业教育的同志和部分学校领导,深入学习中央《决定》,当时有人对中专列为中等职业教育并发挥骨干作用还有些不理解,他就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明中专不仅属中等职业教育,而且根据中专的办学条件和长期办学的经验,中专应义不容辞地在中等职业教育中发挥骨干作用,带动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后来他又在各种场合,阐述中专在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各地办好中专,发挥在中等职业教育中的示范作用。

为了全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教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劳动人事部共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职业教育会议,职业技术教育司负责会议筹备工作,他和司长孟广平同志、副司长孙震瀚同志,到地方基层学校、和有关部门、企业、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筹备组向国务院和相关部委领导,报送了13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背景简报,引起了相关领导的极大关注。李鹏同志亲自参加会议并讲话,明确提出,职业技术教育“要大家来办”的方针,即教育部门、工厂企业、劳动部门和社会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都来办职业教育。为此,这次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方针是:“要加强领导,改革体制,统筹规划,因地制宜,结合需要大力发展,实行多层次、多种形式、大家来办。”在发展中注意调整和提高,努力增进社会效益,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这次会议对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战略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上,李鹏同志的讲话充分肯定了中专的重要作用,但也提出中专在新形势下需要深化改革的问题。据此闻友信同志和职教司的领导抓紧部署,积极推动中专的改革。经过充分准备,1987年8月10日,职教司在北戴河召开了全国中专教育座谈会,明确了当时中专改革的重点:改革管理体制,扩大服务面向,克服部门所有制局限。从分配环节入手,改革招生分配制度。把加强实践

教学作为教改的突破口,要把教学、技术(社会)服务、生产实践三结合作为办学的基本路子。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中专的改革,各部门和地方都行动起来,结合实际情况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如1987年12月10日,国家教委和卫生部支持中专学校与医院联合培养护士,实施产教结合。1988年4月5日,农牧渔业部、国家教委等8部委发出《关于农业中等专业学校招收农村青年不包分配的若干规定》,支持农业中专改革。闻友信同志从到职教司任职后,就很重视农业中专的改革,他深入四川温江农校、浙江嘉兴农校调研指导改革,使这些学校成为当时农业中专学习的典型。1991年6月,国家教委还在浙江嘉兴农校召开中专改革招生分配制度现场会。农业部也很支持农业中专的改革,到1992年2月,农业部转发《关于嘉兴农校改革招生分配制度为科技兴农服务情况的报告》,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部门积极进行了中专改革试点,闻友信同志在推动中专改革方面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闻友信同志还十分重视并积极推动职业教育的对外交流工作。积极开拓对外交流渠道,吸收国外有益经验。他和职教司的几位领导积极努力,在1983年争取到了国际开发协会为我国提供贷款3550万美元,兴建17所短期职业大学,后来又争取到了世界银行中国职教贷款项目5000万美元。这个项目依托国内相关职业技术学院,充实和建设了12个职业技术师范学院,59所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对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骨干示范作用。德国的双元制很有特色,国务院领导和国家教委领导都很重视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调研工作。在中德政府推动下,从1983年开始教育部就和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在南京、杭州等地和上汽进行德国双元制职教的实验。为了扩大引进德国双元制的地区,国家教委在1998年组织了沈阳、苏州、无锡、常州、沙市、芜湖6个大城市主管副市长和教育、劳动局长及这些城市参加实验学校的校长,赴德国举办了近1个月的学习德国双元制职教经验的考察学习班。这个班层次高,涉及部门多,闻友信同志承担了领队的重任,他精心组织协调,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德方和中方人员都很满意。这个班的人员回国后都在当地积极进行了双元制的

推广试验,取得明显的成效。闻友信同志还到过许多国家考察,他和日本农业职业院校的专家建立了长期联系,介绍了日本培养新型农民的经验,对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也有启示。

依法治教是贯彻落实中央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为此,从事职教工作的同志都很盼望国家制定一部《职业教育法》。考虑到我国大规模发展职业教育的时间还不长,许多问题还在积极改革探索之中。很快制定一部《职业教育法》,时机还不够成熟。职教司决定由闻友信同志组织人员先进行立法的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行政性条例,供各地规范职教的发展。他对此项工作很认真,积极搜集各种资料,结合我国职教现状,经过多次研讨,在1989年起草了一个《职业教育条例》。这个条例虽没正式颁布,但为后来起草《职业教育法》提供了重要参考的基础。经过多年准备,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纲要》对职业教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并提出了要建立教育的法制体系。当时我国教育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正在加紧制定中。为了贯彻落实纲要的要求,国家教委决定从1993年起成立了《职业教育法》起草小组,小组成员包括了有关行政部门、学术机构、社会团体等各方面代表。闻友信同志当时虽已不再担任行政领导,但他代表中国职教学会参加了《职教法》领导小组,以他过去起草《职业教育条例》的经验和长期在职业教育方面的丰富实践活动,对起草《职业教育法》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1996年5月15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国职业教育法》并正式颁布,这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闻友信同志对此做出了贡献。

在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先后建立了职业教育的学会组织。闻友信同志很重视发挥群众性学术团体的作用,认为它是职业教育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组织,为了在全国尽快建立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他和司局的领导同志积极推动,于1985年12月“全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筹备组”成立,在安徽召开了筹备组成立大会。闻友信同志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组织工作。经过几年的筹备,1991年5月,经民政部批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正式成立,他担任秘书长长达10

年之久。学会办公条件差、人员少、经费困难,他克服各种困难,承担了学会的日常工作,不仅维持了学会的日常工作运转,还和地方、部门联合,提出了开展学会活动的许多新思路。他很重视把握社会主义方向,强调这是学会工作健康发展的保证。他总结了学会工作要“三服务”的工作原则,即服务于职教事业发展需要,服务于职教改革的需要,服务于基层工作的需要。他在学会工作中形成了依靠群体、勤俭办会的优良传统。在他的具体推动下,职教学会的机构发展很快,共吸收了73个团体会员,还组建了一批跨行业、地区的专业委员会科教服务部等,还组织了许多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如1994年在上海举办了经济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研讨会,1995年举办了“海峡两岸职业教育研讨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还推动职教刊物的出版,开展群众性科研,评选优秀科研成果等活动,受到群众欢迎。在他离开行政领导岗位后,几乎为学会工作投入了全部精力,他还积极参加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理论研究活动,并担任该社职教理论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他承担了国家教委教育科学“七五”“八五”规划重点项目“职业指导的理论研究与实验”、“农村创业指导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研究工作,并为课题主要负责人。这两项课题研究历时近10年,取得了重要成果,提出了根据我国特点进行指导和创业指导的理论与方法,并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这些成果是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就业和职业教育的有力的配套措施,现在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推广。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又受邀参加了由何东昌同志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他承担了教育专题史丛书中《职业教育史》的编写工作,这项任务很艰苦繁重,有很强的思想性,需要正确的理论观点,又要搜集处理大量的史料。他不顾年事已高,又患高血压病,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在数年时间内,他花费了大量心血,参与了多次研讨,数易其稿,终于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完成了《职业教育史》的编写。这本书系统地论述了新中国广大职教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史实准确,论述科学,史论结合,总结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历史经验和教训。书出版后,受到职业教育界的重视,第一次印刷的书,在较短

时间内就售完。出版社又再次重印,这反映了他编的这本《职业教育史》受欢迎的程度。

闻友信同志在几十年从事职业教育管理和学术研究中,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无论什么工作他都十分敬业,认真细致,关心基层,联系群众,作风朴实,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受到与他共事的同志们的尊敬。他从事职业教育管理工作那段时期,正是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初期,无论在社会观念上、办学条件上、办学思路上,都有许多困难和问题。他和职教战线的同志们,共同奋斗,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在保持我国职业技术与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建设工作,促使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健康发展。同志们将永远怀念他对我国职业教育的贡献。在《闻友信教育纪念文集》出版之际,我仅以此短文表达对他的纪念。

2008年6月7日

序 二

孙震瀚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原司长孟广平同志病重住院期间，曾对探视的学校的同志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很幸运，遇到了两位很好的战友，和我搭班子的孙震瀚、闻友信，都是心胸坦荡，有很强事业心，又善于研究的好同志，大家心朝一处想，劲往一块儿使，千方百计想为战线多做事情。我非常珍惜这段友谊，常常感慨我们之间没有官场上的那些令人厌恶的东西。另外，司里的同志还这样来评价这个集体：他们都有各自的特长，有个性，又能互补，是有朝气的的一个班子。我也经常听到地方和学校的同志有这样的评价：你们这个班子是学者型的领导，堪称本行业的专家。

以上讲的是包括闻友信同志在内的过去职教司的一个领导群体。对于这些溢美之词，他是当之无愧的。这是一个直观的描述。再深层面还可以多说几句：他们都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青年时代他们就追求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树立了坚定的革命理想；他们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训练，经受过艰苦的实践锻炼和考验；他们的思维方法和行为准则是：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计名利，真干实干；他们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说真话、实话，不说假话、空话。

我和闻友信同志相识到相熟是从1982年开始的。他过去从事高教管理工作，职业技术教育对他来说是件新事物，可是他凭着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行为习惯，凭着已往成熟的领导经验，很快进入角色成为该领域的内行。就我看到的，他特别重视深入基层，学习总结一线的实践经验，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观念，提出新措施，并且重视传播这些新经验，写文章就成为他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讲话和文章，都是亲自动笔，从来不要别人代劳。所

以他的讲话和文章有新意、有深度,讲的是自己的话,是白话、实话,平实无华,可谓作者有激情,读者有收益。

还应当说的是,闻友信同志是一位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他爱好文学艺术,在他所写的文章中观点鲜明、修辞造句准确,他严于律己又善待别人,勤勤恳恳做事、干干净净做人。

也有人说我们有主观保守的一面,这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我认为真理是必须坚持的,对于我国职教的优秀传统,是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对于体制和教学的重大变革,先试验后推广,这是一种科学的工作路径,不要急功近利。应当说,在这些方面,闻友信同志是正确的。他是主管普通中专教育的领导,他积极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在推动中专教育改革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2008年4月14日

拓展教育空间 扩大服务面向

(代前言)

闻友信

(1999年1月)

世纪之交,教育科学规划办要大家深入思考一下21世纪教育观问题,这是很有见地的举动。一个民族的根基在教育,科技的发展基础在教育,中华民族能否在下一世纪真正傲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关键也在教育。那么新世纪教育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个能适应新世纪要求的教育观,依靠群众智慧编织新教育观,当然不失为一种上策。

我一辈子从事教育,由高教到职教,很少静下心来想想教育观。这次学科组约稿,真有点让人发憊。教育观是一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大工程,也是一门大学问,近乎洋洋大观,自己功底很浅,谈这样大题目,感到很惶恐。继而一想,几十年教育实践,感触也不少,平常做工作,实际也是对教育观的一种选择和取舍,如果说些零碎杂感,也许于事有补。

一个好的教育观,我认为至少对教育的整体性、民主性、时代性和科学性要有较为透彻的见解。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好像还没有完全解决,若明若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教育的发展。

先说教育的整体性。研究战争要研究战略,战略在胸,就能决胜于千里之外。下棋讲究全局,全局若定,就能运筹帷幄。一个好的教育观,也要做到整体优化,才能协调发展。教育的整体集中反映在总学制。透过中国近代教育史,你能看到从晚清起,历届政府抓教育必先抓总学制。最早是“癸卯学制”。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先生十分重视教育,也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不久北京政府又出台了“壬戌学制”。1927年国民党政府通过一系列法规改革了旧学制,明确了新

学制,反动政权垮台逃窜台湾一隅后,这个学制在台湾仍沿袭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周恩来总理主持讨论人民教育的新学制问题。到1951年10月,政务院就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明确了人民教育的新学制。

对一张简练的总学制图,为什么大家这样重视呢?因为它体现教育的总体思想和总体脉络,能够起到总揽教育全局的作用。教育关乎国家大计,犹如搞大型建筑工程,你不能没有总体规划和初步设计,就急于去做技术设计和局部施工。如果这样做了,必然会出现杂乱无章、破绽百出的局面,带来极大的盲目性。有时即使局部看来很成功,但不可能代替全局取得总体的和谐与完美。

联系我们的教育,近50年来确乎取得很大的成就,尤其是近20年更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但如果你从长远角度深入思考一下,还是要为至今未有一张总学制图(即各类教育定位、相互关系及学制要求总体格局)而遗憾。现在教育发展过程中那么多的“撞车”、“抢道”、“自立门户”等种种困惑和矛盾,难道不与此相关吗?!

当然,出现总学制图空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人民教育不同于过去一切教育,人们对此缺乏经验,虽有老根据地多年的办学传统和经验,但由于根据地教育长期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一直以干部教育和短期训练形式为主,这与和平建设时期以正规学校教育为主体的教育相比有着很大距离。而且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环境,谈新学制只有向苏联学习,所以1951年的新学制就存在很多苏俄教育的成分。不久,毛主席提出要走自己的路。1958年的教育革命就是一次初步探索和改革,如果仅从教育思想角度来说,那次探索是很可贵的,出现了不少新意,可惜这个势头被“左”的错误思潮所误导,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其次,也受历史环境的局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运动不断,整个教育已被搞得千疮百孔,还谈什么总学制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教育得到大改革、大发展,一系列相关的重要决定、法律相继颁布,使教育事业蒸蒸日上。新的历史机遇对教育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面对这

种情况,恐怕是到了应该运用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改革所取得的成就,通盘考虑一下总学制图的时候了。50年的实践,一方面使我们看清了局部有序发展,总体无序运行所带来的种种局限和矛盾;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了很好的工作条件和基础,为我们取得了进行这项工作的主动权。

多少年来,搞教育工作的(除高层领导人外)一般都是搞哪一类教育的就着重考虑主管的哪一块;不少学者也多以教育学的一般原理或者用各类教育的一般运转过程替代教育观,至今看不到针对中国实际论述教育的整体结构(含总学制设计)的论著。有的讲教育思想,本应综合多方面见解(如民族传统教育思想、领导人教育思想、基层教育家教育思想、外国的教育思想、学者的教育思想,等等),然而往往对此忽略,较多是照述政府、领导的方针、政策、见解和古、近代教育思想,很少能看到由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或具有真知灼见、能反映我国特色的当代教育思想。不把各方面智慧集中起来,是难以产生出较为全面、能适应我国需要的新教育思想的,没有这种新的教育思想作基础,就难以设计出或理出一张好的总学制图。

现在我们的教育,很像北京市的道路系统,多向交叉,拥挤堵塞,成绩巨大,问题不少。今后大小马路如何并存,路、桥如何连接,车辆如何行驶,奖罚如何得体,都需要从全局着眼梳理。拿出什么样的总体方案解决矛盾,决定于要有一个清晰的总体思路。

教育也一样,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并列,方式上又分学校教育、非学校教育,层次上又分高、中、初,证书上又分学历与等级,功能上又有多功能与单一功能,等等,正因为体系各异,错综复杂,矛盾就多,更需要有个总体思路。做到既要帮它们解决科学定位、分清任务、明确作用问题,又要帮它们互相融通、协调发展的问題。

有了总学制图,有助于有序运行,无论管理或改革也能把握要领;相反就容易无序运转,产生内耗。现在就有很多关系不清、盲目发展的问題,比如教育这个总口子内涵和外延如何明确?是仅含教育系统,还是总揽劳动、社会系统、党校系统、国防系统?体外运转利弊何

在？它与管理体制是什么关系？又如常说各级各类教育，但类有多大，级有多少，也法无定论，难怪有些部门可以因管理职能调整而改变教育的性质。难怪中专称谓可以毫无根据地膨胀到七八种之多。诸如此类问题还有不少。

当然，以上问题，并不都是总学制问题，然而总学制图毕竟是教育思路的集中反映，长期没有，多少说明教育思路还不能摆脱模糊状态。这种总体思路“不清”（或某些不清），必然带来体制“不顺”，“不清”、“不顺”抓起来怎么能“有力”呢？自然，总学制图不可能轻易形成，一蹴而就，需要反复实践，但是半个世纪的历程，应该说有了基础，是到了可以组织大家着手研究的时候了。

至于教育的民主性，我想无非是两个方面的，一是教育平等，一是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对教育的需求。对于前者，过去我们是做得好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人民的教育，革命成功后，学校的大门开始为工农大众打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教育平等。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经济调整等原因，又出现了诸多隐性的不平等问题，如不加以关注，将影响社会安定与发展。

目前，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十分旺盛，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需与供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人民群众很多求学的愿望，得不到实现。是不是教育的负荷已到了极限呢？看来还不能一概而论，从不少学校校园规模、师生比例、房屋设备使用率、教育资源总量上看，潜力还是可以挖掘的。问题恐怕在观念上。教育界20年改革跨出了很大步伐，但不可否认，还有不少习惯偏见和陈旧观念在束缚自己的手脚，是否可以再放开一些。比如，招生规模问题，过去有过教训，招生过多过猛会影响质量和增加就业压力，这是事实。但计划和教育部门也应看到，目前某些客观条件已起了变化，如就业不包分配、实行竞争上岗，人才储备就可适当考虑。

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还不发达，就业不足是一个长期问题，如果仍按计划经济期间有多少新增岗位就招多少学生的办法，可能会导致人力开发的滞后。从一般劳动力开发转变为技能或智力资源要有一个过程，适当考虑一定的提前量，允许一定量的技术、智力资源处于储备

状态,这对于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劳动者上岗竞争能力都是极为有利的,同时也有助于职工队伍的合理流动与调整。

关于质量管理是否也要作些分析,教育采取多渠道、多元化发展,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律要求。不妨采取证书分级、学校分类、专家督导、加强监管的办法进行质量控制。我认为学校至少可分为两类,一类好比是“国家队”、“明星队”,是领头羊,出名牌、出精品、出特色,质量与国际接轨,因此必须始终保持高标准。另一类不强求他们达到高限,主要承担一般教学任务,按合格标准衡量评估。两者之间可视优劣情况在适当时候作些调整。

此外,在入学资格上是否也要区别对待和适当松动,对于本科以下教育层次和一般学校,宽进严出并不是不能考虑。当然,宽进不等于没有要求,否则不但教学无法进行,而且也对入学者极不负责。现在的主要矛盾不在于过分降格要求,而是大批符合入学起点的学生被拒之门外。每个专业的入学起点是不同的,其实可以委托专家作些较为合理的规定。

宽进严出,应该允许淘汰,只要上学机会多元化,不是一锤子定音,淘汰就不会遇到多大阻力。

宽进严出,也能调动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如根据实际条件规定招生最大规模,超负荷状态是可以防止的。据说,人口高峰回落,很多城市小学过剩,取消一些限制,让外地务工人员子弟入学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还可考虑改招文化补习班。

总之,对人民群众的各种教育要求,应该比过去更多地倾听和支持,全面地考虑分析,采取更主动积极的态度和灵活的办法,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国家政府有困难之处,也可增加透明度,发动大家献计献策。

再说教育的时代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教育观。现代教育的特征就是高度尊重人的教育。满足人生存的三个最基本的需要,即帮助人处理好三个最基本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人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我的关系。能在这三方面都教育好的就是好教育,做得欠缺或不好的就是不完全的教育。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违背自然、伤害自然,不但不能可持续发展,而且最终自取灭亡。现代教育就要帮助人去正确认识自然,认识自然对人的必不可少性,认识当前人对自然伤害的严重性,伤害自然要受法律制裁,法治是积极的手段,教育更是既积极又完善的手段。

人与社会休戚相关,人要从自然的人变成社会的人,主要依赖教育。每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人要生活,首先要生存,要学会说话、写字、处理信息,才能相互交流、沟通、合作。要生存就要学会劳动和创造财富,取得生活资料,依托信息化手段与生产资料生产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提供社会服务,让社会进行交换和扩大再生产。

人与自我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克服自我、超越自我的关系,使自己不断提高和进入完美的境界,古人强调理性、理念的修养,现代人还要扩展到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艺术等方面。

20 世纪的教育在功能上较上一世纪起了很大变化,更加全方位,更加注重实用,因而重要性也更加突出,它既服务于人,也服务于全社会。21 世纪的社会和人,更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和人,对教育的需求远比过去更丰富多彩、灵活多样。所以,教育除了继承和搞好现有教育外,还必须大胆开拓和创新。特别是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日渐与我们接近以后,教育的模式、格局、思想都会起根本性的变化。各类教育之间的界限可能会模糊起来,相互交流融通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教育的空间将前所未有地扩展,教与学的关系(除启蒙教育外)也会调整变化。我认为,至少有两种教育要出现,一种是能满足人们创业要求的教育,一种是能够满足兴趣爱好的教育。他们求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取得学历和证书,也不是为了取得职业资格和等级,而是为了获得创办事业或精神创意的动力和能量,追求人生价值。目前已出现的企业家培训、老年大学和青少年特色技能培训仿佛具有这种色彩。而江苏、北京正在倡导的创业教育也似乎包含这种内容。21 世纪是更加强调创新的世纪,重视开发人的潜能的教育,是最有前途的教育,创业教育可能使职业教育得到新的发展。

这种教育在 50 年代曾经萌芽,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两种劳动制度